



徐鉉集校注

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Xu Xuan's Complete Works

上 册

李振中 校注

中華書局



國家社科基金
後期資助項目

徐鉉集校注

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Xu Xuan's Complete Works

上册

李振中 校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徐鉉集校注/李振中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16.10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101-12144-5

I. 徐... II. 李... III. 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北宋 IV. 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25375 號

書名 徐鉉集校注(全二冊)

校注者 李振中

叢書名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責任編輯 許慶江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張 63 1/4 插頁 4 字數 900 千字

印 數 1-1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144-5

定 價 268.00 元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前　言

一　徐鉉生平及著述

徐鉉(九一七—九九二),字鼎臣,其先爲東海鄉人,祖籍會稽(今浙江紹興),生於廣陵(今江蘇揚州)。徐氏祖先起兵反對周穆王,失敗後被迫南遷會稽,以後便“積慶所鍾,令嗣蕃衍”(胡克順宋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責受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年七十六行狀,以下簡稱徐公行狀)。曾祖源,祖徽,皆不仕。父延休,仕吳衛尉卿,才高道直,有名於時(李昉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以下簡稱徐公墓誌銘)。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陸游南唐書卷五徐鏗傳)。鉉弟鏗,字楚金,亦有名於江南,時號“二徐”(宋史卷四四一徐鉉傳附)。

徐鉉十六歲仕吳,起家校書郎。李昪建立南唐,官至秘書省秘書郎。元宗即位,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徐公行狀)。保大七年(九四九)三月,徐鉉兄弟指責殷崇義(入宋改名湯悅)起草軍書援引不當,被宋齊丘誣爲洩露軍事機密。徐鉉因此被貶泰州司戶掾,徐鏗貶烏江尉(宋史徐鉉傳)。保大九年春,徐鉉被召歸

京。十一年秋，奉命出使楚州、常州，察訪屯田事宜，將侵擾百姓的官吏斬首，被馮延巳、李德明等誣陷爲藐視皇權，擅作威福。元宗偏信讒言，十二月，長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鉉校書郎、分司東都（資治通鑑卷二九一，以下簡稱通鑑）。十四年三月，徐鉉量移饒州，不久回京。次年，授太子左諭德，復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徐公行狀）。北宋建國，元宗遷都豫章以避其鋒，徐鉉扈從南巡。元宗殂，徐鉉又護喪歸金陵（十國春秋卷一六）。後主繼位，奉命出使嶺南（本書卷一四劍池頌）。開寶二年（九六二）徙爲尚書左丞，逾月而罷。拜爲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六年，任御史大夫。七年，拜兵部尚書、修文館學士承旨。曹彬大軍壓境，南唐危在旦夕。八年九月，徐鉉與周惟簡奉使入宋，請求緩師。據理力爭，不失使節（徐公行狀）。

開寶七年十一月，後主出降，徐鉉隨之歸宋，任太子率更令。宋太宗即位，徐鉉任太子率更令、直翰林學士院。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春，隨征太原。師還，以功遷給事中，直翰林學士院如故（徐公墓誌銘）。七年九月，參編文苑英華（王應麟玉海卷五四）。八年，改右散騎常侍、判尚書都省（徐公墓誌銘）。雍熙三年（九八六），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定說文解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以下簡稱續長編）。端拱元年（九八八）改左散騎常侍、判尚書都省如故（徐公墓誌銘）。淳化二年（九九一）九月，爲廬州女僧道安誣讐，貶邠州，爲靜難軍行軍司馬（宋史徐鉉傳）。因冷疾卒於貶所。

徐鉉是南唐至宋初重要的文臣，堪稱一代文宗。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徐公文集（亦稱徐騎省集、騎省集、徐常侍集、徐鉉集）三十卷，稽神錄六卷（郡齋讀書志卷一三），質論一卷（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篆書千文一卷（郡齋讀書志附志），古鉦銘碑一卷（翟耆年籀史），射書五卷（補五代史藝文志），摹圖義例一卷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棊勢一卷(補五代史藝文志),金谷園九局圖一卷(通志略藝文志),雜古文賦一卷(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草木蟲魚圖(六家詩名物疏引用書目載),江南畫錄拾遺(圖畫見聞志卷一),元宗皇帝實錄(本書卷二〇謝詔撰元宗實錄表)。合著的有:江南錄十卷(與湯悅合著,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吳錄二十卷(與喬匡舜、潘佑合著,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翰林酬唱集一卷(與王溥、李昉、湯悅合著,見通志略藝文志)。另外,與句中正等合修說文解字,參編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續長編卷二七)、文苑英華(王應麟玉海卷五四)等大型典籍,校定中庸(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六九),補正三家老子音義(王應麟玉海卷五三),讎校三洞瓊綱(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四)。遺憾的是,徐鉉獨著的作品,僅有徐公文集(其中有晁錯論、伊尹論、出處論,宋文鑒卷九三錄其君臣論、持權論、師臣論,或是質論部分篇章)及稽神錄傳世,其它均佚。

二 徐鉉的人格與操守

徐鉉爲官居中守正,不結黨營私。南唐元宗時期,黨爭激烈,而徐鉉不列其中(馬令南唐書卷二〇)。徐鉉心性率直,毫無矯飾。李至等祭文稱其“天然渾成,不加雕琢”,“其馨如蘭,其直如矢”,東都事略卷三八徐鉉傳云:“鉉恬淡無矯僞。”

徐鉉十分注重獎掖後進。其答林正字書云:“振天下之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下於昔賢。”在舉薦或知貢舉時,以德行優先,精鑒無私。徐公行狀云:“其知舉也,不獨考其文章,必先察其德行。”徐公墓誌銘云:“其掌貢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爲得士。”“故江表後進力學未至者,聞‘二徐’爲春官,

多望風引退。”

徐鉉廉潔節儉。徐公行狀云：“自幼至老，惡其聚斂貪冒，未嘗微寘於懷。俸祿所入，不問多少，隨時供億而已。居處求安，不務顯敞，但聊以蔽其風雨。”

徐鉉嫉惡如仇。與常夢錫、蕭儼之爲莫逆之交，同力嫉惡宋齊丘一黨。及宋黨敗，常夢錫已卒，蕭儼之時貶吉州，徐鉉適時規諷後主：“夢錫先卒，不見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之目覩朝典，況臣塵忝，官列八座矣。獨蕭儼之往爲理官，以赦前失人，貶黜吉州，以老告退。願以臣今所居官授儼之，旌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建業，特授工部尚書，給俸祿終身。
(徐公行狀)

徐鉉盡忠生前，褒美身後。出使北宋，公而忘私，臨危不懼。徐公墓誌銘云：“初，大軍已圍建業，後主思命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請行，後主謂之曰：‘爾既往，即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公曰：‘是行非全策，今城中所恃者救兵，奈何以臣此行止之？’後主曰：‘比以和解爲請，復用決戰，即是自相矛盾，於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之重？但置臣於度外耳。’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節，汝有之矣！’”面對宋太祖責問，徐鉉據理力爭，太祖亦深爲敬佩。徐公墓誌銘云：“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太祖亦爲之動容。”徐公行狀云：“王師之弔伐金陵也，公急病讓夷，請使於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辯疑分謗，且服罪降名。以鄙人爲請，庶不隳奕世之國祀。……及觀太祖，敷奏忠慤，執議誠信。雖不得請，太祖亦甚嘉歎，美其秉節無撓。”

徐鉉不辱使命，歷來爲人所推重。李至曾寫五君詠，其一爲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徐公真丈夫，不獨文章伯。江南兵未解，主憂臣慘戚。公願紓其難，苦求使上國。庶獲一言伸，少息苞茅

責。其君驚且歎，執手涕沾臆。謂言知爾晚，何此忠義激。天子叱在庭，誚讓雷霆赫。公亦從容對，曾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略其小，我有春秋癖。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庶驚事君心，勉旃希令德。”李至此詩專爲徐鉉使宋而寫，概括出其勇置生死於度外、欲挽狂瀾之既倒的無畏氣節。雖然未紓國難，但辭色不撓，從容應對，爲全一邦之命作了最大努力。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文集序云：“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蘇轍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云：“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旦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

徐鉉奉命撰吳王神道碑與江南錄，於其中不忘故主之恩，思存君臣之義，尤受人推重。魏泰東軒筆錄卷一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徐鉉撰碑。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義，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又有偃王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四庫館臣騎省集提要云：“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神道碑。……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儼偶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有體。……然則鉉之見重於世，又不徒以詞章也。”指出徐鉉見重於世，不徒以辭章之妙，亦因其人格之美。

三 徐鉉的儒道思想

徐鉉是五代至宋初的儒學大家，其儒家思想主要包括君臣觀念、濟世與兼善思想、文教思想等。

君臣是封建綱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君臣觀也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徐鉉的名與字中就體現了儒家思想中君臣觀念。說文解字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鼐。”易經衷論卷下“鼎”條云：“鼎之爲器，豈不重哉！……大臣任天下，國家之責如鼎受物之重。……古稱公輔爲鼎臣，有以哉！”

徐公行狀云：“著質論十四篇，極行政之要，盡君臣之際，並傳於世。”質論已佚。徐鉉有晁錯論、伊尹論、出處論以及君臣論、持權論、師臣論（宋文鑒卷九三），或是質論中的部分篇章，從中可以看出儒家對其影響之深。

在上述文章中，徐鉉認爲，君臣是天地萬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君臣同體，相互推心，則政因此而和，事以是而濟。君臣共事中，君臣是否同體共心，則取決於君之賢否。徐鉉指出，君臣相合，猶如天地相交；君臣相失，則似天地並行。而天地是否相交，君臣是否一體，人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爲人君居於上，招致賢臣較易；臣子居於下，遇明君甚難。故而賢君當屈己下士，推誠接物。如其不然，則君臣相失。然臣失君，只喪其富貴，而君失臣，則亡其國家。君臣如何能用心一體，徐鉉提出了較爲行之有效的辦法，即作爲人君應當師臣、友臣。人君爲天下表率，當注重威儀、氣量，以法治國，明辨是非。人君能招徠賢臣與否，關鍵在於慎用權力，賞罰分明，而賞罰應出於公，不出於己。徐鉉認爲，作爲臣子，要有君君觀念。其連珠詞三云：“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疏。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捨自殊。”從君君理念出發，反對臣子兵諫；在出處論中指出，君子或出或隱，當因時、因事而論。當出則出，當隱則隱，有迫不得已者，然而君臣大節，則不可失。以臣伐君，其惡爲大。

徐鉉有十分濃厚的忠君、戀君思想。詠梅子真送郭先輩云：

“忠臣本愛君，仁人本愛民。”劍池頌云：“忘身徇國，忠臣之節也。”貶官泰州出城作云：“唯有戀恩終不改。”送劉山陽云：“所嗟吾道薄，豈是主恩輕。”

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思想，在徐鉉詩文中體現得非常鮮明。濟世與獨善，始終是其行動指南：“士君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喬公亭記）“道之泰也，賢人振衣而濟物；時之否也，君子括囊以獨善。”（大宋故處士贈太子少師李公墓誌銘）行道濟物，立身揚名，是徐鉉一生的目標追求：“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嘗有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受任，不以爲憂。”（復方訥書）

禮樂文教，是儒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方法。徐鉉雖處易代之際，文教思想却始終如一。他非常重視教育，先後爲宣州、泗州、舒州等地文廟作記或作序，又爲洪州奉新胡氏兄弟所創辦的華林書堂撰記，集中體現了他的文教思想。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歷述儒家教化之興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輔國濟民。然斯教衰於戰國，廢於嬴政，漢魏以降，續而復絕。其後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舒州新建文宣王廟碑序一文中同樣追慕貞觀文教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徐鉉認爲，應當依儒家“聖人”思想立教。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上承天地萬物、下啓萬民教化的主要君臣，而中國自古君師一體，所以聖人也包括那些有能力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道統的才德之士。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云：“昔我先聖，有周公之才，無文王之時，故憲章其道，以垂萬世。……夫聖人之教也，與天地常在，將陰陽並運，恍惚玄應，昧者不知。”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云：“士君子承積善之慶，服聖人之道。……教被於俗，仁之周也。”如此等等，均強

調憲章聖人之道，教化則易見其效。

徐鉉一生不僅受儒家思想影響，還受道家思想影響。徐公行狀云：“公業隆儒行，奉五常而不隳；志嚮道風，稟三寶而無玷。”徐公墓誌銘：“祖丘軻兮宗老莊，奉三寶兮師五常。”正是由於徐鉉爲“好道之徒”以及對道教及其著作的熟習，官方常令其刊正或校讎道教經典。端拱二年（九八九）或稍後，徐鉉與王禹偁、孔承恭奉太宗之命校正寫本道藏經以及讎校三洞瓊綱，補正三家老子音義。徐鉉詩文中，有很多與道士往來或爲道觀題詩、撰文之作。其清心練氣、保精養神、追求升仙等等思想，都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鬼神信仰是道教的思想淵源之一。徐鉉好神仙鬼神，宋史卷四四一本傳言其“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續長編卷八云：“唐主事佛甚謹。……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然絕好鬼神之說。”他所作志怪小說稽神錄，其中有很多怪異故事。之外，劍池頌、龍山泉銘、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祖先生墓誌序等文章中也記有怪異之事。這些都體現了徐鉉的鬼神信仰。

四 徐鉉的文學思想與詩歌風格

在詩學思想上，徐鉉首先是力主教化。在成氏詩集序云：“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這裏所說的“詩之用”，就是通政教、察風俗，即指詩歌的政治功能及道德功能；“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即毛詩序中“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之意。文献太子詩集序又云：“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

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惻可戒，贊美不誣，斯實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啓，人文化成。……賞物華而頌王澤，覽稼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邊塵而閔行役。……理必造於玄微，詞必關於教化。或寓言而取適，終持正於攸歸。”徐鉉強調詩之用是使王澤下流和使物情上達。在強調主教化的同時，又強調要用“美刺”的方法，即寫詩要以物譬喻，以小見大，不怨刺、不虛美，注重含蓄委婉，從而達到“寓言而取適，終持正於攸歸”的效果。這樣才能“厚君臣之情，敦風化之本”（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這與毛詩序所言“主文而譎諫”及屈原用香草美人表達情感的方法一脈相承。

在文學的表現形式與內容方面，徐鉉把內容放在首位。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強調說：“至於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闡述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先內容後形式，作為修飾之“文”要服務於“道”；同時也重視外在形式的“文”，即講究氣格、措辭、音韻等。這種觀念類似於中唐梁肅、柳冕、韓愈、柳宗元等人關於文的理論主張。只不過韓、柳等人強調以文載道而徐鉉以詩載道罷了。徐鉉遙承這一理論主張，也是針對晚唐以來文風漸趨浮豔綺靡的背景。

其次主張吟詠情性。即注重個人的情感抒發，屬於個體心理特徵。其成氏詩集序：“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情性，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在徐鉉看來，詩的教化功能是第一位的，如斯道不行，則退而求其次。這裏的黼藻其身，就是以詩陶冶内心，使之臻於完美。鄧生詩序中：“古人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於道，無位於時，不得伸於事業，乃發而為詩詠。”這裏的“發而為詩詠”與韓愈所提倡的“不平則鳴”不同，而是以詩作為排遣内心抑鬱的一種手段，從而達到調節心理狀態、維持心理平衡

的客觀效果。以詩自娛自適，成爲徐鉉詩歌創作的主要源泉與動力。

第三是追求嘉言麗句，音韻天成。成氏詩集序云：“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

徐鉉的文論思想，首先是崇尚遁文麗句。他是五代宋初的駢文大家，其所撰制、册、表、奏、序、記、碑、銘等，都能體現這一追求。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云：“琅邪王公，負英俊之才，稟耿介之氣，世濟其美，爲時而生。遁文麗句，冠縉紳而傑出；純誠直道，歷險夷而安貞。”徐鉉對王祐文章的遁文麗句給予了熱情推重：“觀其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調律而不浮，尋既返覆，如‘四子’復生矣。”所謂麗而有氣，即遁文麗句之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徐鉉文章“沿溯‘燕許’”。其中，沿溯“燕許”，不僅僅就體格而言，更是從氣格上祖襲。蘇頌、張說繼“四傑”之後，爲文注重氣格雄健宏麗。姚鉉唐文粹序云：“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群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不變習俗。”徐鉉提倡爲文剛勁有力，正是氣格方面與二人一脈相承。徐鉉爲求遁勁有力，作文還有一套方法和道理，那就是爲文敏速，嘗云：“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疏慢。”（徐公墓誌銘）

在文論思想上，徐鉉還注重實用。通觀徐鉉的文章創作，以制誥章奏、傳狀碑誌等應用文體爲主，體物抒情的極少。例如“賦”這種文體，最能顯示個人才學，楊吳與南唐有很多以賦而聞名，尤以江文蔚、高越兩人名氣最大，時稱“江高”。以徐鉉之多才，這種文體却很少，也是他爲文崇尚實用的明證之一。

徐鉉作爲當時文學的“冠冕”與“文宗”，其詩作有“貞元元和之風”（陳彭年江南別錄）、“元和風律”（吳之振宋詩鈔卷二徐騎省集鈔序）。元方回送羅壽可詩序云：“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

體’、‘昆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鉉、鍇)、王元之(禹偁)、王漢謀(奇)……”此後，人們便以“白體”來評價徐鉉詩的風格。“白體”內涵也主要指白居易詩淺切易曉、不重典故的詩風。通觀白居易詩歌，就連琵琶行、長恨歌等相對典雅的詩歌也不用典故，因有“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弔白居易)的說法，其他詩歌更是老嫗能解。白詩用典幾率很小，有時幾卷詩中也找不到一首。然而徐鉉詩好用典故，甚至用典生僻。例如，卷二寄歙州呂判官“任公郡占好山川”中的任公典：

任公:指呂判官。任姓之國有呂國。左傳隱公十一年:“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楊伯峻注:“諸任，謂任姓十國。正義引世本姓氏篇，任姓之國有十，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又，此處兼以任昉比呂判官。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四載:歙州，隋開皇十二年置，古屬新安郡。梁書卷一四任昉傳載:任昉曾任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同上書卷三徐摛傳:“(高祖)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卧治此郡。’”

又如，卷三得浙西郝判官書未及報聞燕王移鎮京口因寄此詩問方判官田書記消息“曾得劉公一紙書”中的“劉公書”典：

三國志卷一五魏書一五劉馥傳:“嘉平六年薨。……謚曰景侯。子熙嗣。”裴松之注引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此借以頌美郝判官。所用事典，僅舉兩例，不及其餘；至於語典，讀本書所作箋注，便覺寓目皆是。徐鉉詩歌以學問為根基，注

重用典而思深語近，屬對精工而清新自然，其詩風，似與白詩不同。關於徐詩風格，真有進一步研究、辨正的必要。

五 徐鉉的影響

徐鉉是易代之際文學演變環節中的重要鏈條，這主要取決於他的文學地位和創作實績。徐鉉向來有一代“文宗”的稱譽（見陳彭年江南別錄、歐陽修徐鉉雙溪院記、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五）。入宋之後，徐鉉的儒雅風采及文學才能依然為中朝士人所傾慕。徐公墓誌銘云：“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義，多質疑於公。繇是琴樽嘯歌，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得甚歡，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於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李至更是“手寫鉉及其弟鑑集置於几案”（宋史卷二六六李至傳）。徐鉉的博雅風采與文學才能獲得了當時南北文人的普遍贊賞與尊重。在唱和中，其詩歌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技法、結構方式、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等都可能給對方以影響，進而影響文學群體、文學潮流、文學流派等。

徐鉉的文學影響，主要還通過其弟子及再傳弟子的文學基因傳承表現出來。徐鉉弟子入宋較為著名的有吳淑、鄭文寶、陳彭年、杜鎬、胡克順等人。前四人在興趣愛好、主要的學術及文學成就方面，與徐鉉都十分相似，可知他們在師承中，受徐鉉影響很深。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事類賦提要云：“淑本徐鉉女婿，學有淵源。”正指出了二人的傳承關係；陳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為文”等特點，與徐鉉更有驚人相似之處。

徐鉉的文學基因，通過幾代師徒依次傳承，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宋初百年文學演進中，成就較大的代表人物先後有王禹偁、楊億、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最為巧合的是，他們幾人除王禹偁為北方人外，其他均為南方人，在地域上同屬原來南唐轄區，而且又有一定的傳承關係：陳彭年為徐鉉弟子，同時又是晏殊的老師。晏殊“幼能文，李虛己知滁州，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因薦於楊大年，大年以聞。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成，明日再試，文采益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師陳彭年”（司馬光《涑水紀聞附錄二溫公日記》）。陳彭年與曾致堯唱和，並將作詩之法傳授給了晏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為晏殊門生。晏殊知貢舉時，擢歐陽修為第一。歐陽修年譜云：“翰林學士晏公知貢舉，公復為第一。”（歐陽修全集附）王禹偁東都事略卷五六云晏殊“當世賢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等皆出其門”。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歐陽修晏公神道碑銘：“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宋史卷三一—晏殊傳：“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王安石以第四名及第，曾往謝晏殊（夏承燾二晏年譜）。

上述師承可簡化為：徐鉉→陳彭年→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以上所列，只有王禹偁、楊億與徐鉉沒有明顯的師承關係。然而，王禹偁曾與徐鉉同朝為官，又因道安一案而為徐鉉雪誣，以致獲罪，貶官商州。王禹偁詩歌內容、風格流易方面等與徐鉉有較多相似，應當屬於受徐鉉影響的後進之一。至於楊億，正如沈松勤先生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壇演